



晚清民国学术书系

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

以1815至1900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

邹振环 著

新平知覺
PDG

上海古籍出版社



晚清民国学术书系

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

以1815至1900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

邹振环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 以 1815 至 1900 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邹振环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12

(晚清民国学术书系)

ISBN 978 - 7 - 5325 - 4793 - 7

I. 西... II. 邹... III. 西方国家—历史理论—影响—中国—清后期 IV. K09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4816 号

晚清民国学术书系

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

——以 1815 至 1900 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

邹振环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625 插页 5 字数 367,000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500

ISBN 978 - 7 - 5325 - 4793 - 7

K · 1030 定价: 32.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绪论	1
一、本书论题的几个关键词：西方、传教士、西史东渐、 历史译著	1
二、研究的起点与时限	5
三、学说史的回顾和本书突破点	9
四、本书的结构	22
 第一章 米怜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的史学篇章	28
一、米怜与英华书院	28
二、最早的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34
三、《全地万国纪略》所介绍的四大洲和米怜的历史观	37
四、《法兰西国作变复平略传》中所反映的法国大革命和 拿破仑	46
 第二章 麦都思与最早的比较历史编年体史书 《东西史记和合》	52
一、麦都思及其中文译著	52
二、比较叙事中的东方与西方	55
三、“和合”的历史见解与对比叙述方法的特点与价值	61
 第三章 “外国史”与“万国史”——马礼逊父子的 《外国史略》和郭实猎的《古今万国纲鉴》	66

一、“华夷”时空观与朝野“空间知识”的拓展·····	66
二、马礼逊父子的《外国史略》·····	77
三、“万国”与“万国史”概念的形成·····	91
四、郭实猎与《古今万国纲鉴》·····	97

第四章 裨治文与最早的美国史志《美理哥

合省国志略》·····	104
一、《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与历史文化的清晰度·····	108
二、修订本《大美联邦志略》的体例与译名上的“归化”·····	114
三、初版与修订版在史学上的影响·····	118

第五章 慕维廉的《大英国志》与晚清国人对英国

历史的认识·····	125
一、《大英国志》的版本与体例·····	126
二、《大英国志》蕴涵的知识信息·····	129
三、蒋剑人的历史译名与历史认识·····	138
四、《大英国志》的价值及其影响·····	142

第六章 林乐知与最早的年表体史书《四裔编年表》····· 149

一、《四裔编年表》编译者和出版者·····	149
二、《四裔编年表》的体例和特点·····	155
三、学界的回应与中西时间观念交融的意义·····	160

第七章 傅兰雅与最早译出的西方战争实录

《防海新论》·····	172
一、《防海新论》的版本与译者·····	173
二、《防海新论》的内容与叙事视角·····	178
三、《防海新论》的影响与意义·····	184

第八章 谢卫楼的《万国通鉴》与晚清史书体例的演变	189
一、谢卫楼与《万国通鉴》的译本版本及资料来源	190
二、《万国通鉴》史书体例的特色	198
三、《万国通鉴》所透露的神学观念和科学事实	203
四、《万国通鉴》与晚清史书体例的演变	212
第九章 艾约瑟及其输入的西方古典史学与《西学	
启蒙十六种》中的欧洲史	218
一、艾约瑟的生平与中文著述	218
二、《希腊志略》中的古希腊历史与政治	225
三、汉文文献中最早介绍的古希腊诗歌、戏剧、雕刻、哲学	
与科学	232
四、《罗马志略》中的古罗马历史与文明	240
五、艾约瑟笔下的罗马诗人与雄辩术	246
六、西方古典史学的译介	250
七、作为区域史模型的《欧洲史略》	257
八、《西学启蒙十六种》的流传与艾约瑟所传之希腊罗马	
古典学的影响	260
第十章 李提摩太与《泰西新史揽要》：“世纪史”的	
新内容与新形式	269
一、《泰西新史揽要》的原本、译本与改编本	269
二、李提摩太选择这一三流“世纪史”的缘由	281
三、《泰西新史揽要》的新内容与新形式	286
四、对晚清“阅读世界”的影响	293
结语：晚清西史东渐的影响与意义	308

附录一：晚清(1822—1900)历史译著提要	327
一、世界通史、世界各国志	329
二、地区史、国别史	337
三、编年史、年表、年鉴、世纪史	366
四、专门史(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科技史、战争史等)	371
五、历史传记	390
附录二：晚清(1822—1900)历史译著分类统计表	397
引用文献	402
人名索引	422
书刊、篇名索引	438
后记	460

绪 论

一、本书论题的几个关键词：西方、传教士、西史东渐、历史译著

书名即本书的论题,虽然很直白,但仍有解释的必要。首先是“西方”的含义比较复杂。在古代东亚人和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中,与“东”相对的“西”是指印度文化大区 and 伊斯兰文化大区,其中印度文化大区包括印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三国,该区宗教为多神论。明清以来的“西”主要是指基督教文化大区,它包括了欧美的大部分地区。这一文化大区一般又可分为以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希腊等为中心的天主教文化区;包括英国、爱尔兰、荷兰、挪威及主要移民来源于此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新教文化区;以俄国、德国为主的东正教文化区的众多国家。讨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我们一般所讲的“西方”概念其实也是一个变量,开始专指英国,后来扩大到欧美。

晚清来华的主要是西方新教传教士,与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不同,在康熙禁教前,天主教传教士在华的传教任务,主要由各个宗派和“会”来承担的,这些会的传教活动都由罗马教廷直接管辖。而晚清来华的西方新教传教士则不同,尽管他们也有宗派的区分,如主要活动在华南沿海广州与厦门的美部会;以福州为重点的美以美会;活动中心在上海的伦敦会与监理会;传教据点一度在宁

波的长老会;主要活动在香港后从广东发展到山东等地的浸礼会;活跃在长江中下游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圣公会;活动重心在四川等地的内地会,等等。但这些都只是概而言之,新教传教士人数众多,却组织分散,活动有连续性,但传教区没有固定的划分,活动区域广泛,不同的宗派和“会”常常会同时活动在一个省和一个城市;很多新教传教士活动的地域色彩并不明显,总的趋势是由南往北,由东往西,由沿海沿江到深入内地。晚清新教传教势力发展迅速,如内地会 1877 年只是在内地三个省立下脚跟,到 1890 年除了湖南外,已经遍布于中国各省。到 1900 年以后新教布道站(由外国传教士直接经管)的数目约 500 个,而分站(由中国人照管)的总数达数千之多。1874 年有 436 名新教传教士,1889 年达到此数的三倍,到 1905 年则上升到 3 445 名。新教传教士 90% 以上是英国人和美国人。英国新教传教士一般出身于中等阶级,少数进过大学。美国新教传教士大体上来自小城市和穷乡僻壤,男性传教士通常是某个教派高校的毕业生。^① 新教传教士参与世俗活动与进行知识传播的特点也与明清之际传入的天主教不同,新教传教士的世俗活动大多不受教会宗派的指派,而是以个人形式且很少受到教会宗派的干预。他们与明末清初来华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最大不同点,还在于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后都受到了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因此,增加了对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宗教传播和世俗文化活动评价的复杂性。本书所讨论的主要是西方新教传教士所从事的历史译著活动。

“西史东渐”即西方史学传入中国,首先是指西方历史著述在中国的翻译活动。“西史”是一个晚明才出现的整词,意谓“西方历史”或“西方史学”。该词出现在汉文文献中与传教士有着密切的关系。译成于 1627 年诠释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名理

^① [美]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页 612—613。

探》一书,在“诸艺之析”一节中最早提到了历史学:西方的“言语之伦”有“谈艺”、“文艺”和“辨艺”三方面,另外“又有史,西云‘伊斯多利亚’(希腊文 Historiai 音译)”,是“欲动人心”的学科。^①这是关于史学最早的音译词。^②在明末清初才广泛使用的“西史”一词,有指“西方史家”或“西方学者”的,如《新法算书》中多次出现的“西史第谷”、“西史多禄某”;也有指“西方历史著作”的,如明末1623年刊刻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职方外纪》一书卷二载:“欧逻巴西北有四大国,曰‘大泥亚’(今译丹麦),曰‘诺而勿惹亚’(今译挪威),曰‘雪际亚’(今译瑞典),曰‘鄂底亚’(今译爱沙尼亚)。与‘亚勒玛尼亚’(今译日耳曼、德意志)相隔一海套,道阻难通,西史称为别一天下。”^③“东渐”一词出现很早,《尚书》中有“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④“渐”是“入”的意思。最早将“西史东渐”这一整词用之于论文题名的可能是史革新《20世纪初西史东渐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轫》一文。^⑤

笔者认为西方史学的概念术语、西方史学著述的体例、西方史学的观点在1900年前的晚清那一段,主要是通过汉译的“西方历

① [葡]傅泛济译义,李之藻达辞《名理探》,商务印书馆1935年,页6—7。

② “历史学”或“史学”一词一般认为是从日本引入的,1879年“历史学”一词已经出现在日本学者翻译的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所著《英国文明史》的第一编第七章。汉文文献中目前已知最早在1901年《清议报》上使用了这一词汇。南朝梁沈约撰《宋书·隐逸传·雷次宗传》载:“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但该词还不是今天意义上“历史学”一词的简称。1885年艾约瑟编译的《西学略述》一书中已使用“史学”一词,来对译History,可能是汉文文献中最早在现代意义上使用了“历史学”一词的简称,《西学略述》分10卷,卷6为“史学”。1902年陈黼宸《独史》一文中有“泰西史学所以独绝于一球者矣”(载《新世界学报》第2期,1902年9月16日),此“泰西史学”即“西方史学”之意。

③ [意]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页96。

④ 《尚书·禹贡》,《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页153。

⑤ 该文系2003年10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国际研讨会”论文,后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9卷)第2期。

史译著”引入的,本书所讨论的“西史”概念,主要是指“西方历史译著”,故本书使用副标题以使研究宗旨有着更精确的涵义。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甲骨文中就有“史”字,早期的“史”是指人,即从事史的记载的史官。现代“历史”有三层涵义: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二、过去事实的记载;三、历史学科。“历史”作为一个整词最早可能出现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的裴松之注中。裴松之注引《吴书》:“(吴主)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南齐书·鱼复侯子响传》云:“积代用之为美,历史不以云非。”明代李廷机和叶向高曾校订前人所删《资治通鉴》节本,书名为“新刻校正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袁黄(了凡)编纂有《历史大方纲鉴补》,两书均刊于万历年间。王世贞著有《历史纲鉴补汇评》。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二《修志十议》中有“夫历史合传独传之文具在”之语。上述“历史”都只是“历代之史”、“历代编年体史籍”或“历代纪传体史籍”的省称,没有我们今天意义上学科的涵义。晚清出现的一些历史课本多采用“各国史略”、“中国史记”、“万国通鉴”、“东洋史要”、“支那通史”等名称。用“历史”翻译 History 一词的是日本学者,而日本学者使用“历史”一词当然也是首先来自汉语系统的《历史纲鉴补》,1663 年日本曾出现该书和刻本。^① 福泽谕吉在 1860 年撰写的《西航记》中述及西方学科之分为五:“第一语学,第二历史……”首次使用现代意义上的“历史”一词。被誉为最初的英和对译词典——1862 年由日本开成所刊印的堀达之助等人所编《英和对译辞书》最早将 History 译成“历史”。^② 福泽谕吉在 1866 年所著的《西洋事情》和 1875 年著的《文明论概略》等书都广泛使用了“历史”一词。“历史”这一整词后来也进入了日本文

① 毛一波《“历史”一词的来源》,载台北《大陆杂志》1963 年第 27 卷第 9 期。

② 参见周振鹤《逸言殊语》,浙江摄影出版社 1998 年,页 208。

部省章程作为科目的名称。19世纪末中日交往频繁,日本的译词也进入汉文文献,1889年,黄遵宪访日归来所著《日本国志》的三十三卷《学术志·西学》中,介绍日本兴办西学的情况时提到:“明治四年,设立文部省,寻颁学制于各大学区,分设诸校……有小学校,其学科曰读书、曰习字、曰算术、曰地理、曰历史。”这可能是中国汉文文献首次使用具有现代涵义的“历史”一词。^①

而“译著”一词最早可能见之于《宋高僧传》卷十二:“摩腾入汉,译著斯文。”这显然还是一个动词,将“译著”作为翻译著述来使用似乎是在晚清,对佛典翻译有着深刻理解的严复较早将“译著”对应 translation,1902年他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中指出:“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②“西史”一词,在1900年后则包含着相当部分属于“西方史学”的内容,因此,笔者认为使用“西方历史译著”来讨论1900年前晚清的“西史”,较之使用“西方史学输入”要更精确。

二、研究的起点与时限

西方史学究竟何时传入中国?这是一个长期困扰着中国学者

^① 1899年3月,罗振玉为东文学社重刻日本汉文名著《支那通史》所作的序中也使用了这一整词。1901年罗振玉、王国维等在上海创办了《教育世界》,在该刊《序例》中称:“此杂志中所译各学教科书多采自日本。考各种教科书有可通用者,如动植物、理化之类。有须特撰者,如读本、地理、历史之类。兹译日本教科书为蓝本,海内学人若据此编润成中国合用之书,则幸甚。”(《教育史界》1901年第一卷第一期)以后“历史”整词开始进入教科书,被许多采为书名,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普通书室有重校本《普通新历史》,这本书20世纪初在中国广泛流传。1902年出现了两湖文高等学堂出版的陈庆年编写的《中国历史》和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陈懋治编的《中国历史》;1903年有文明书局出版的丁宝书编著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和东新译社出版的曾鲲化编纂的《中国历史》上册。此后“历史”这个词一直被各种教科书反复沿用。

^② 王栻主编《严复集》三,中华书局1986年,页561。

的问题。^① 本书的论题旨在讨论“西史东渐”和“西史译著”，应该有义务来尝试回答这一问题。笔者认为，“西史东渐”与“西学东渐”中的许多门类不同，如西方地理学是从明末清初开始传入的，而西方史学输入起点则是在晚清。为什么西方历史译著没有在明末清初就传入中国呢？这一问题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给研究生开设“明清西学史”课程时，就曾受到过若干研究生的质疑。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尽管传播了许多西学文献，也笼统地提及西方史书，如《职方外纪》中的“西史”，利玛窦在《译几何原本引》中也曾提到了“列国史传所载”，并讲述了若干西方的历史史实：“吾西国千六百年前，天主教未大行，列国多相并兼，其间英士有能以羸少之卒，当十倍之师，守孤危之城，御水陆之攻，如中夏所称公输、墨翟九攻九拒者，时时有之。”^②若干耶稣会士在“天学”的名义下，也编译过教史方面的著述，传达过基督教历史的内容，^③李祖白执笔撰写的《天学传概》称“考之（指如德亚，今译犹太）史册，推以历年”，^④可见该书作者已经接触过若干西史。但综观明清之际，目前我们尚未发现西方耶稣会士曾经编译过西方历

① 20 世纪 80 年代杜维运就不断探索这一问题，在《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一文中指出“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确定时间，是一个颇难明确答案的问题。”参见杜维运著《与西方史学家论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81 年，页 289。20 年后周文玖《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一书仍然重复杜维运的问题和结论，并称：“西方史学何时传入中国，现在还难以说得准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页 277。

② 参见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页 300。

③ 如徐宗泽所编《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卷五“教史类”就曾列出过 19 种汉文西书，但是通过仔细考察，不难发现，其中大部分属于宗教人物传记（少量由西方传教士编译），如《圣教信证》、《道家学传》、《大西利先生行迹》、《徐光启行略》、《奉天学徐启元行实小记》、《思及艾先生行迹》、《张弥格尔遗迹》、《悌尼削》、《安南副教先生》等，还有若干是属于宗教论辩文献的汇编，只有《人类源流》和《天学传概》比较接近于严格意义上的教史，且大多是中国学者根据中国传统史书的体例编写的。参见徐宗泽编《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年，页 172—184。

④ 《天学传概》，载《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四卷，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 2003 年，页 31。

史著作,绝大多数中国士大夫也未接触过西史,像杨光先几乎完全否认西史的存在,他批评李祖白说:“试问祖白:此史册是中夏之史册乎,是如德亚之史册乎?如谓是中夏之史册,则一部‘二十一史’,无有‘如德亚天主教’六字,如谓是如德亚之史册,祖白中夏人,何以得读如德亚之史?”^①

西方传教士在明末清初没有译介一般西方历史著述之原因,实在很值得探讨。明清之际的西方传教士和西方学者都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曾经大量阅读过各种中国正史、编年史、方志和实录等,不仅编纂了《中华帝国全志》这样影响深远的历史著作,而且还编译了中国的历史著作,如法国传教士冯秉正译出了朱熹的《通鉴纲目》,于1778至1785年在欧洲出版。他们对中国的史书体例,如纪传体、编年体、典志体都极为重视,清初一些耶稣会士的索隐派学者还专门研究中国编年史与西方历史的对比问题。笔者认为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没有译介西方历史著作的原因是: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由于当时欧洲大学尚未将史学作为大学的专门课程,而来华的西方耶稣会士又没有受过很好的历史学写作的训练,他们在华译述的其他领域的西学著述大多是欧洲大学的课本,而在历史学没有进入欧洲大学成为独立的学科之前,自然也没有合适的历史教科书可供他们选用翻译。何况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学是一个强项,西方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后,首先面对中国丰厚的历史遗产,他们很快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著作的国度,而通过学术传教的基本原则,就是要通过西方的学术优势来诱导中国士大夫信奉天主教,他们在中国士大夫面前是要展示西方学术的强项而不是弱项。面对丰厚的中国史学成

^① 杨光先著,陈占山校注《不得已》,黄山书社2000年,页8;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称:“中国不信教人士对世界历史和地理,所知极少。”上册,香港公教真理学会、光启出版社1967年,中华书局影印本,页25。

就,这些没有受过专门史学训练的耶稣会士不知道应该如何选择合适的西方历史著作介绍给中国士大夫,以便吸引他们和使之佩服西方学术,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如果选择不当反而会适得其反,使中国士大夫瞧不起西方。这可能是导致明清之际尚未有西方历史著作译介和传入中国的原因。

因此,笔者讨论“西史东渐”和“西方译著”的问题,自然是以19世纪初西方新教传教士的译述活动作为起点,将1815年马礼逊和米怜所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作为本书讨论的开端。这里还需交代一下笔者把1900年作为晚清西史输入的一个分界点的理由。1900年前,西方史学的输入几乎都是通过西史的译著来实现的,因为近代中国早期引入西方史学与日本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史学东传日本的过程中,历史译著并非唯一的渠道。日本在1888年由政府出面聘请德国历史学派创始人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的再传弟子里斯(Ludwing Riess, 1861—1928)到日本,执教于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直接向日本学者传授西方史学。而1900年前中国没有聘请西方史学家到中国直接传授西方史学的实例,而受过西方史学专门化训练的日本学者到中国新式学堂教授历史学课程,也是1900年之后的事情。换言之,1900年前西史东传中国的主要渠道就是译著。笔者统计到的1900年为止的89种历史译著中,中国学者编译的作品虽不在少数,但是这些中国人编译的译著绝大部分都是传教士译著的二次再编译,或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对西方传教士译著的采摘和模仿,基本未脱西方传教士西史译著的范围。而1901至1911年这一段西史东渐史的内容比较繁复,除了仍然有大量西方传教士参与翻译西史外,中国学者的翻译西史活动日益活跃,其中日本的因素最为突出。除了上述由受过西方史学专门化训练的日本学者到中国新式学堂担任教习教授历史学课程外,还有大量的译著是据日文转译的西史,或是经过了日本史学家消化过的西史作品。因此1901至1911年

的十年间,除了有来自英国史学、美国史学、德国史学、法国史学的影响外,还有日本史学和俄国史学的影响。为了避免在论述中将上下两个时段所呈现出的特点混为一谈,本书将 1815 至 1900 年视为一个单元进行考察。

本书讨论的“晚清”,自然是一个时段的概念。它与“清末”一词不同,“清末”多将 19 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作为起点,而下限是指学术界通用的 1911 年清朝被推翻。但“晚清”的概念比较模糊,上下限似乎目前学界仍没有统一的主张。笔者使用“晚清”而不用“清末”一词,主要出于该词较之“清末”具有更大的弹性,“晚”是指清朝在政治上日薄西山,“晚清”可以是一个不很精确的时间段限,出于上述的理由以及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来考虑,本书的“晚清”时段主要是指 19 世纪初至 1900 年近百年的“西史东渐”的历史进程。

三、学说史的回顾和本书突破点

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旧史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近代新史学和世界史学思潮的息息相关。因此,研究晚清“新史学”的关键就是要将其放到世界史学发展的整体框架内来把握。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学界所关注的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问题,几乎都是围绕梁启超的《新史学》展开的。这一研究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为台湾著名史学家杜维运在《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①一文中所提出,该文将 20 世纪前 50 年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分成初期(晚清)、二期(1912—1937)、三期(1938—1949),认为世界两大

^① 杜维运《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原载《台湾大学历史学报》1976 年 5 月第 3 期;收录氏著《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附录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81 年,页 288—335。

系统的中西史学,相去绝远,各自独立发展两千余年,不通声息。以中国方面言之,19世纪末以前,中国史学自辟蹊径,不受西方史学任何激荡;明末清初中国史学不曾流传到西方,西方史学也未曾输入中土。认为“中西史学各自独立发展2 000余年,到19世纪末叶才相会”。他高度评价梁启超在输入西方史学方面的功绩,且从观念史的角度出发,认为严复翻译《天演论》才是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开始。^①按照杜氏这一分析线索而将西方史学传播主要定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主要研究成果还有:台湾学者林正珍《晚清知识分子引介西洋史的若干问题——以梁启超史学思想为中心》(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6期,1988年6月)。

大陆学者从史学史角度较早讨论这一问题的是张芝联,20世纪80年代他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史学的特点》一文中,也涉及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问题,然基本思路仍然不脱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传播这一见解。^②以后较多讨论这一问题的代表性论著,尤以张广智的研究为突出。他强调中西史学的直接接触是在19世纪末,认为直至19世纪晚期,中西史学才

① 在1985年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系举办的“中西史学史学术研讨会”上,杜维运在专题演讲《中西史学的盛会》中又重述这一观点,参见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364。

② 该文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少存在着中华民族和入侵的帝国主义、改良与革命、儒家思想与新近输入的西方各种社会理论、崩溃中的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类型的生产关系四大矛盾,而第三对矛盾就涉及如何向敌人学习的问题。该文作者认为学习西方大致经历了解世界地理、学习制造武器和军舰、学习外国历史和制度、学习西方社会思想和理论四个阶段。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史学,从总体上来说,是与同时代的世界史学主流并行发展的。由梁启超新史学运动所代表的对传统史学思想和史学编纂学的反叛是第一次有意识的努力。“它力图赋予过去以新的生命,按现今的需要来复兴历史研究,从而对麻木沮丧的民众施加进步的影响,促进民族的觉醒。它摒弃了许多陈腐的历史观念,大大地拓宽了历史学家的眼界。它把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活动的一切形式都起了作用。它对外国历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引进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载张芝联《从〈通鉴〉到人权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页61—67。